

中国东南亚研究现状: 制度化阐释

唐世平* 张洁**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 制度性因素对于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政府需求、中国与东盟的相互依赖以及大众传媒在中国的兴起则是影响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三个主要因素。这些因素提升了东南亚研究在中国的地位, 促使东南亚研究以经济与政治(包括安全)为重点领域。但是另一方面, 这三个因素却使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面临着学术贡献与政府需求、学术贡献与大众需求之间的艰难平衡, 并有可能使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将自身置于满足政府和大众短期需求、损害长期能力建设的困境之中。因此, 本文认为需要从机制的角度来考虑如何矫正中国东南亚研究中的建设与发展问题。

【关键词】 中国 东南亚研究 制度因素

*** 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相互交往的历史渊源颇深, 因此自然成为中国政府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图从制度的视角阐释中国的东南亚研究, 而不是对其进行综合的历史考察。

本文集中研究为何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会整体上的制度环境所影响, 这种影响是如何形成的, 未来这一制度环境将会如何继续影响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具体而言, 本文认为, 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受到三个因素的深刻影响: 来自中国政府不断变化却又稳定增长的需求; 中国和东南亚之间越来越深的相互依赖(这一点也部分或者间接地通过影响政府需要来影响东南亚研究); 以及大众传媒的兴起。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从机构设置的角度回顾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历史; 第二部分将简要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战略与防御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原为2006年1月笔者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举办的国际会议“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Chin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上发表的英文会议论文, 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毛悦译成中文, 特此感谢。

制度的视角是指学术界和社会的制度模式很大程度上深刻地影响着寻求知识的过程。从制度的角度理解追寻知识的过程也可以被理解为“知识的社会学”。See Karl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Routledge and Keegan Paul, London, 1956; Max Scheler, *Problems of 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Manfred S. Frings trans., Routledge and Keegan Paul, London, 1980。与以上文献不同的是, 本文强调: 即使在社会科学领域, 也有普遍真理, 因为笔者同意 Popper 的看法, 认为知识的累计在长期来看是自我修正的过程。See Karl Popper, *Objective Knowled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Routledge and Keegan Paul, London, 1979。

关于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历史考察, 可参见贺圣达: 《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成就和展望》, 载《世界历史》2003年第2期, 第102~112页。比较的考察, 可参见王赓武: 《新加坡和中国关于东南亚研究的两种不同观点》, 载《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2期, 第1~15页。

回顾建国以来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历程,并突出其中的一些重要发展;第三部分将此与前文提到的三个因素联系起来;第四部分着眼于研究的前景,讨论如何通过改变制度来改善未来的研究状况。

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机构设置

从机构设置的角度来看,当今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包括三种显性或隐性的分工。

第一种分工(显性)是附属于高校的研究

机构和附属于中央或地方的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之间的分工(见表1)。高校研究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培养新一代的研究人员,这主要是通过研究生教育得以实现。而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机构或多或少带有思想库的性质,培养研究人员的任务相对较轻,因而研究生教育项目较少。因此,尽管近年来高校提供了优厚的待遇,开始从思想库吸引学者(尤其是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研究生的流向大部分还是单向地从高校流向各级社科院的研究机构。

表1 中国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主要学术机构

机构名称	地点	成立年份	研究人员人数	期刊
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州	1959	27	无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州	1960	25	《东南亚研究》,双月刊
暨南大学华人华侨研究所	广州	1981	9	无
云南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	昆明	1981	16	《东南亚》,季刊
福建社科院华人华侨研究所	福州	1983	7	《华侨华人与侨务》,季刊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	北京	1988	12	《当代亚太》,月刊
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	南宁	1989	21	《东南亚纵横》(原名《印度支那》),月刊
上海社科院亚太研究所	上海	1990	12	无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厦门	2000	20	《南洋问题研究》,季刊 《南洋问题译丛》,季刊
北京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	北京	2002	不详	《北大亚太研究》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 和太平洋研究所	北京	2002	不详	《现代国际关系》,月刊
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	郑州	不详	不详	无

注: 所有资料来自各研究机构网站。尽管最初各研究机构有显要的或潜在的研究专长领域,但目前几乎所有机构都朝着全面发展和跨学科的方向发展。

该中心1956年建立时名为南洋研究院,主要致力于对东南亚华人的研究。

该中心1979年成立时名为印度支那研究所。

该中心是北京大学内部跨系项目,主要资源来自历史系、国际关系学院和东语系。

第一种分工也导致了第二种分工(隐性)。社科院研究机构的主要职责是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建议,而高校的研究机构在其中只起辅助作用。在撰写重要的政策建议时,尽管社科院的学者会向高校的学者征

求意见,但最终成果通常由前者起草完成。

第三种分工(显性)存在于决策中心所在地——北京和上海——的研究机构与地方研究机构之间。决策中心的研究机构几乎是单一地为中央政府服务,而地方的研究机构则

主要为地方政府服务。这样的分工使前者更容易接触到国家决策。同时, 尽管地方研究机构有责任向地方政府提出政策建议, 但其另一个重要作用则是支持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游说。不同的分工在地方和中央的研究机构之间建立了一种特别的关系, 即尽管两者间并无正式的等级关系, 但后者必须尊重前者, 以确保地方研究机构在中央申请课题项目时, 中央的研究机构至少不会过多地发表反对意见。这已成为双方的一种默契。

在理解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机制时, 需要考虑到上述三种分工方式。

中国东南亚研究发展过程中的 三个制度性因素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及通常意义上的地区研究)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 建国以来政府不断变化但稳定增长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东南亚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 90年代以来大众传媒在中国的兴起。

(一) 政府需求: 不断变化但稳定增长

长期以来, 影响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及其国际/地区研究)最关键的制度性因素是政府不断变化但稳定增长的需求, 尤其是在制定对外政策方面的需求。

建国之初,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牢牢地把握着制定外交政策的决策权。在这种背景下, 学术界(包括思想库)几乎没有机会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当时, 主要是由政府部门(如外交部、军方以及情报部门等)负责了解、研究东南亚国家(以及其他国家)。

因此, 尽管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些从事东南亚研究的机构成立时, 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必须将外部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区域进行研究, 但是这些研究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 政府对其直接需求非常少。

中国的第一代东南亚研究学者能够根据个人的兴趣进行学术研究, 而无须满足政府的需要, 原因之一也就在于政府对其并无太多的直接需求。因此, 这一阶段发表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 海外华人华侨研究以及东南亚的历史文化研究。在这一时期,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改革开放的推行, 不仅标志着意识形态完全统治外交政策时代的结束, 也标志着中国决策机制至少在两方面逐渐非集中化。

一方面, 中国决策过程的风格与现代国家越来越接近。为了制定有效的政策, 政府开始自觉地向各种团体征求意见, 其中包括学术界、思想库以及已退休的高官等。究其原因, 不仅是因为政府意识到学术界可以向决策过程提供建设性意见, 还因为政府认识到或者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 政府机构自身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了解外部世界的需求。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经常化、广泛化和深入化, 中国的利益也逐渐扩展到世界每个角落, 每天都有新的问题不断产生。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机构不可能独自承担了解如此多样的世界各国的任务, 其中的一部分必须由包括思想库在内的学术界来分担。这一发展促成了政府与学术界之间新关系的形成。尽管政府拥有最终决策权, 学术界影响力的实现依赖于政府, 但学术界在决策过程中获得了真正的发言权。

另一方面, 尽管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权牢牢地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 但是地方政府(尤其是省一级的政府)也必须研究一些紧迫的问题。这些问题带有越来越多国际问题的

当然, 这并不是否认其中一些地方的政策建议会最终得到中央的认可, 并形成国家政策。《昆明倡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协议最初由云南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云南社科院提出, 但随后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

色彩,如边境贸易、边境控制、人口贩卖和毒品走私等。正如阿什(Ash)指出的,中国各地区已经与外部世界发展了广泛而有差异的(经济)联系。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与地方政府关系更加密切,需要政府及时的关注。而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都不太可能得到中央政府的优先考虑,有些甚至根本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对外部世界所知有限,缺乏有效途径了解世界的地方政府,很自然地会求助于地方研究机构。

因此,除了将中央研究机构和地方研究机构之间的隐性分工进一步机制化以外,决策权从中央到地方的扩散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整体发展。随着地方政府需求的增多,地方研究机构的学者现在不仅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和政策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地方政府更多的重视。

决策过程非集中化的这两个表现,以及中国与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外部世界日益紧密的交往,使政府越来越依赖学术界贡献的可行性政策建议。这种日益增加的需要,加之中国经济的发展,最终使东南亚研究(及通常意义上的地区研究)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学科。

(二) 中国与东南亚:相互依赖日益加深
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往的广泛深入,双方在经济、政治(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以及文化领域的联系日趋紧密,因而中国政府全面了解东南亚各国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这无疑对推动东南亚研究在中国地位的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一需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东南亚国家整体发展进程的了解,如新加

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近年来,东盟和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依存度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了解东南亚国家经济形势的需求。

其次是对有关东南亚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的了解,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内金融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中国学者以及其他精英认为,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历史文化以及国情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又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问题,因此研究总结东南亚国家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十分有益,尤其是要确保在通往现代国家的征途中社会秩序的稳定,避免出现发生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例如菲律宾)的社会动荡。事实上,理解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只是中国精英试图探索如何在保证社会政治稳定的同时努力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的一部分。

再次是要理解“东盟方式”,也就是东盟国家的外交和安全行为模式。尽管中国最初加入东盟地区论坛时并不十分积极,但是在1994年成为东盟地区论坛的对话国后已逐渐成为该论坛和“东盟方式”热忱的支持者。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研究安全问题的学者十分关注“东盟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同时,中国也对东盟国家与美国之间逐步发展的安全

Robert S. Ash, "China's Regional Economies and the Asian Region: Building Interdependent Linkages", in David Shan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2005, pp. 96-131.

唐世平等:《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第7-15页。

在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在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作为东亚的奇迹,新加坡这个以华裔为主要民族的国家的历史为中国的精英和知识分子带来了灵感和期望:如果新加坡能成功,为什么我们不能?从以新加坡为题材的论文的数量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新加坡是中国东南亚学者研究兴趣最大的国家(见表3)。

See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Routledge, London, 2001.

关系特别关注。此外,“10+3”亚欧会议、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东亚峰会的启动也进一步增加了中国政府了解东盟国家外交政策的需要。

(三) 大众传媒: 需求不断增加

各种学术期刊的出现标志着东南亚研究已成为一个学科。通过这些期刊,东南亚研究的学术成果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也逐渐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同时,在90年代传媒业逐渐开放之后,公众也越来越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特别是有一定教育程度的公众及社会精英。中国的公

众和社会精英对国际事务的关注程度可能要超过对其他国家国内事务的关注(见表2)。在报纸、杂志以及有关国际时事的广播电视节目中,关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其他国际热点问题的新闻评论随处可见,其中有关东南亚国家的新闻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因此,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对学者通过媒体进行时事评论的需求也逐渐上升。可以说,东南亚研究与其他地区研究一样,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不仅服务于国家利益,同时还要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

表2 关注国际时事的主要媒体

	名称	每期发行量
以国际时事为惟一内容的报纸	《参考消息》	200万份以上
	《环球时报》	100万份以上
	《国际先驱导报》	20万份以上
以国际时事为惟一内容的杂志	《世界知识》	14万份
	《环球》	25万份
以国际时事为惟一内容的电视节目	《国际观察》,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以国际时事为主要内容的电视节目	《今日话题》, 中央电视台英文国际频道	

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对东南亚研究以及国际问题研究有利有弊。一方面,传媒业的兴起有利于扩大东南亚研究以及各种国际问题研究的影响范围,为公众了解国际事务及接受相关的教育提供了更好的途径。同时,也为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提供了更多的媒体曝光机会,使其有机会成为公众所熟知的人物。但另一方面,大众传媒需求的不断增加,意味着做一名严肃的学者不再是谋生和出名的惟一途径。对于一些较年轻的学者来说,做媒体明星比在学术界获得地位更容易,也更有利可图:如果能够通过频繁“上镜”名利双收,为什么还要在简陋的办公室里从事清贫艰苦的工作呢?在这个意义上,学术界的道德基础会被整个社会愈来愈甚的物质化所侵蚀。

中国东南亚研究的现状

上述三个最基本的制度化因素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学科发展。一方面,这些因素使东南亚研究得到政府和公众的关注,但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明显

本文所指的期刊/刊物指研究型期刊,其读者是专业的研究人员,而杂志的读者是一般大众。这样,学者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不能被认为是研究成果,只有在期刊/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才可被视为研究成果。不过,迄今为止,中国只有顶尖的研究机构和高校才逐渐采取这样的标准。

这可能与几个世纪以来遭受的耻辱有关。除中国之外,多数国家都不会有三种主要的报纸只关注国际时事。《参考消息》《环球时报》和《国际先驱导报》都有稳定甚至稳步增加的读者群。

See Wang Gungwu, "Loving the Ancient in China", in Elizabeth M. Brady, ed., *Who Rules the Past*, Oxford University, Melbourne, 1985, pp. 175-195

不足,这三个因素也有一定的责任。

(一) 积极方面

首先,上述三个因素对东南亚研究成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一个繁荣的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从中国发表的关于东南亚的论文数量就可见一斑(见表3)。90年代,有100多部关于东南亚研究的著作出版,这比

过去40年的总和还要多(见表4),尽管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从目前来看,中国学者对东南亚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著作出版的数量没有任何减少的迹象:如果以2000~2004年间出版的著作数量推断,在本世纪的最初10年将会有至少120部以上的著作出版。

表3 中国研究东南亚各国的论文数量统计(1994~2004)

国家	新加坡	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	缅甸	柬埔寨	老挝	文莱
论文数(篇)	740	561	211	198	174	153	140	76	45	22

资料来源:中国期刊网。

表4 中国出版的关于东南亚的主要著作(1958~2004)

时期	80年代以前	80年代	90年代	2000~2004年
著作数量(部)	11	24	115	43

注:此处的著作指独著、合著以及编辑的著作。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图书目录索引。

其次,来自政府的强大需求,加之公众需

要的日益扩大,深刻地影响了当今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重点。中国第一代东南亚研究的学者大多侧重于历史文化研究,几乎与决策无关。而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开始密切关注那些对政府和公众最具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和问题。鉴于目前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满足政府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样的发展趋势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

表5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中各类文章的比例(1994~2004年) (单位:%)

	经济	历史	政治和国际关系	海外华人研究	社会文化
《南洋问题研究》	44.9	16.8	13.0	22.3	2.9
《东南亚研究》	33.0	4.4	41.3	13.7	7.4
总量	37.8	9.4	30.0	17.2	5.6

资料来源:中国期刊网。

目前,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以经济、政治(包括安全)问题为主。通过对已发表论文数量的统计,这一点清晰可见。以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两种主要期刊——《南洋问题研究》和《东南亚研究》为例,在1994~2004年间,这两种刊物发表的关于经济和政治(包括安全)问题的论文占总数的70%左右,而且这一趋势在短期之内将继续保持(见表5以及图1A和图1B)。实际上,在华人华侨这一中国东南

亚研究的传统领域中,情况也大致如此。在1985~1995年间,历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在华人华侨研究中位居第二,但到了1995~2003年间,已经滑落至第九位,而对海外华人经济的研究则稳居榜首。

徐云:《大陆华侨华人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载《暨南大学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115~125页。

图1A 《南洋问题研究》发表的论文(1994~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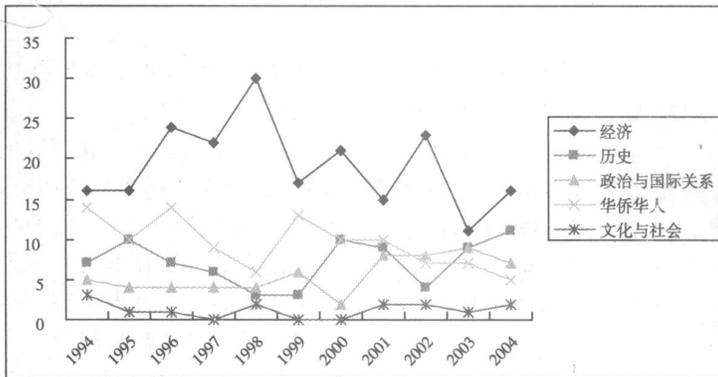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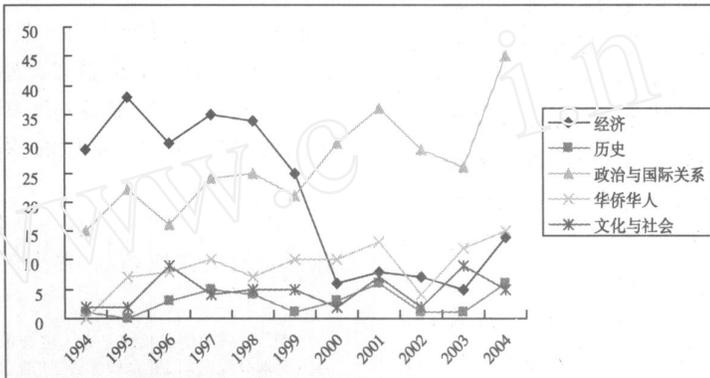


图1B 《东南亚研究》发表的论文(1994~2004)



(二) 消极方面

国际问题研究(包括地区研究和东南亚研究在内)的不景气常常被归咎于学术界和学者自身,即“学术文化”。本文认为,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事实上,制度性因素对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制度不仅通过提供直接需要影响追求知识的过程,而且通过影响个人对不同类型的知识的价值判断间接影响追求知识的过程。

1. 学术和政府之间艰难的平衡

首先是维持学术贡献与政府需求之间的平衡。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包括中国东南

亚研究界)无疑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料,这对学术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也随之产生了

很多中国学者从这一角度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缺陷进行了研究。参见庞中英:《关于国际研究在中国的三个典型问题》,载《欧洲》2000年第6期,第36~41页;苏长和:《中国国际关系学:问题与研究方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第72~75页。据笔者所知,惟一带有制度分析性质的研究是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70~75页。

显然,经济学家对于制度结构对知识寻求过程的影响有更好的理解。参见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0, p. 70; Gary S. Becker,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76, p. 11.

一个问题:学术界如何能够在满足政府需求和坚持自身学术兴趣之间找到平衡点?

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的学术兴趣通常与政府需求是一致的,但是在东南亚研究以及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政府的兴趣与学者的兴趣往往不同,甚至会有冲突,因为政府关注的不是学术贡献,而是清晰实用的政策建议以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学者们经常不得不面对一种窘境:他们自身可能更倾向于相对长期的基础性研究,但是他们的学术影响力与科研条件却依靠政府的认同与支持。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许多学者会更愿意以满足政府的直接需要为己任,一些研究所也倾向于政策研究,而对长期的基础性研究有所忽视。实际上,这种趋势的后果非常严重,一些思想库性质的研究机构的学者已经没有发表学术成果的需要,因为他们的前途几乎完全依赖于政府对其提出的政策建议的评价。即便是许多所谓的学术论文,也更像是对政府的政策建议,尽管事实上政府的决策者只会阅读这些政策建议中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的政策建议根本没有机会被政府采纳。不仅如此,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政府的需求导向还在具体学科内部产生许多盲点。一些学术问题因为不受政府的重视几乎得不到资助,而大多数学者也不愿研究这些资助较少的课题。

这就令人质疑:从事政策研究的学者,如果缺乏深厚的学术积淀,那么他们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还会是合理正确的吗?即使这些政策建议从短期来看似乎是可行的,但其长期影响又如何呢?从根本上说,这种只研究与国家短期利益有关的问题的短视行为将会损害学术界长期为政府提供合理政策建议的能力。

2 学术与媒体之间艰难的平衡

其次是维持学术贡献与公众需求之间的

平衡。在大众传媒时代,为报刊撰稿或在电视台出境比写学术论文更加有利可图,因为大众媒体比学术期刊的报酬丰厚。在这样的环境下,某些学者认为报刊撰稿比写学术论文更合“情理”。

这一点几乎反映在国际问题研究的各个领域,其中也包括东南亚研究领域。例如,在海外华侨华人研究中,在1995~2003年间,学术论文的比重在所有学术期刊和杂志出版物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学术成果(大部分是评论)的比重则逐年上升,2003年学术论文所占比率为64%,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

更糟糕的是,在媒体的诱惑下,许多学者(可能大多为青年学者)敢于评论任何问题。知名学者王缉思对此感慨到,“对圈外人和老百姓来说,很难判断哪本书是为迎合大众的口味,为盈利而做的,哪本书是学术成果。”

媒体兴起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由于媒

这样的情况反映了个人将会根据对其努力的回报的预期来分配时间、资源和才智。才智分配理论实际来源于这一论断:制度不仅为知识提供直接需求,还决定了何种知识技能能够得到回报。参见 William J. Baumol,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5, Oct 1990, pp. 893-921.

这种状况可能还会恶化,缺乏以有深度的学术研究为基础,一些政策建议只是证明了政府决策的正确。

实际上,学术期刊现在已开始取消给作者的稿费,这与国际上通行的惯例一致,学者们必须为学识而不是金钱来写作。

参见徐云:《大陆华侨华人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例如,一位研究中美关系的青年学者甚至在中央电视台讨论雅典奥运会是否能盈利。

Wang Jis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 China Today: Achievements, Trends and Conclus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 China*, The Ford Foundation, Beijing, pp. 19-40; 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第71页。虽然笔者并不反对学者关心自己专业领域以外的问题,但是学者和公众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前者应当评论他相信自己了解的事情。See Friedrich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60, pp. 25-26

体通常只关注所谓的“热点问题”，并且能够提供丰厚的报酬，所以许多研究人员热衷于研究这些问题，并逐渐成为“焦点”人物，而那些从事长期的基础性研究的学者则日益被边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成为“通才”，他们从事长期的、严肃的学术研究的时间大为缩减，对某个具体领域持续的、系统性的研究也相当缺乏。因此，在一些重要的研究机构，要找到对某个国家有深厚的历史、语言和文化素养的专家越来越难，而目前许多学术成果流于肤浅，缺乏深度也就不足为奇。

将才智和资源过度地集中于一些“热点问题”的做法不仅是对人才和资源的浪费，而且在根本上削弱了学术积累的基础——多样性。所以，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以及国际问题研究整体上缺乏多样性的深度研究，最终甚至会无法满足政府逐渐增长的多样化需求。

从这种意义上讲，大众媒体不断增长的需求正在成为构建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的障碍。这种需求不仅挤掉了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而且减少了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尽管学者们现在能够得到更多媒体的关注，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但是他们对人类知识事业的贡献及对社会的贡献其实可能有所减少。

随着中国日益全球化，政府和公众的需求必然会继续增加和更加多样化，中国东南亚研究界（以及国际问题研究界）如果只关注少数热点问题，就将陷入为满足短期需求而损害长期能力建设的危险之中。

历史文化遗产

在中国东南亚研究形成的过程中，制度性因素发挥了显著作用，但这并不等于否认历史文化因素的作用。事实上，制度性因素经常与历史文化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追寻知识的过程。

长期以来，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依赖于第一代学者，其中大部分人是归国华侨或是其学生。这些学者为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并为东南亚研究成为一门学科做出了不懈的贡献。他们取得成就最关键的原因是：这些学者有在研究对象国长期工作的经历，其中大部分人懂得研究对象国的语言。

然而，长期的相对隔绝以及十年浩劫消磨了第一代东南亚研究学者的大部分时间。改革开放后，中国不得不培养并依靠新一代的学者维持东南亚研究这一学科。

首先，语言问题对年轻一代学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在当今以英语为主的学术界，仅仅掌握一门东南亚国家语言显然无法满足要求，学者们不得不掌握英语以求发展，这就意味着，有抱负的东南亚研究者必须学习两门以上的外语。另一方面，尽管少数中国高校一直专门招收学习使用范围有限的小语种语言的学生，其中包括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语言，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条件有限，中国无法提供足够的小语种的集中培训。所以即使有学生愿意学习东南亚语言，也只有其中少数人能够获得这种机会。因此，新一代的中国学者中很少有人能够熟练掌握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既懂得当地语言又精通英语的学者就更少了。多数学者只能依赖二手资料（如翻译成中文或英语的文献）进行研究，而很少引用东南亚国家当地语言写成的原始资料。

其次，由于中国没有能力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以满足大量的课题进行长期广泛的实地考察（以及广义上的学术研究）的需要，加之多数学者不懂东南亚当地的语言，所以中国学者十分缺乏研究对象国生活和学习的

此外，过度集中于对热点问题的研究也与政府的需求有关。政府更关注紧迫的热点问题，因此研究这些问题更易于得到政府的承认。

经历。因而，即使中国东南亚研究的著作层出不穷，但是建立在深入的实地考察基础上的成果却仍然十分缺乏。

最后，文化因素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和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形成。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科学中惟一值得尊敬的学科是史学。然而，随着“科学思想”在中国被广泛的接受，仅仅研究历史不再合宜。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逐渐转移到实证主义：不仅要了解史实，更重要的是了解史实背后的内容。但是，中国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培养远不足以使社会科学研究更加科学化，因为大批刚刚毕业的硕士和博士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受到的训练非常有限，其中大多数人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只适于研究历史。

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前景

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交往的逐渐深入，加之东盟也是中国整体地区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预见中国在东盟的利益会不断上升，至少会维持现有水平。因此，整体上看，未来东南亚研究在中国将会继续兴盛。鉴于中国政府的巨大需要，经济和政治（包括安全）问题的研究将占据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首要位置。同时，历史研究会继续减弱，与此类似，关于海外华人华侨及其与东南亚国家的互动的研究也将居于次要位置。

很大程度上由于前文提及的制度性因素，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在不断发展中将会面临一些问题。如上所述，制度化安排影响着知识和技能习得过程的方向，如果这一论断正确的话，本文认为需要从机制的角度来考虑如何矫正中国东南亚研究中的问题。

首先，尽管东南亚研究能够也应该致力于维持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但是东南亚研究首先必须寻求学术贡献与国家当前需要

之间的平衡。

其次，尽管对青年学者来说，要在国内学术界得到认可，掌握英语以及在西方接受研究生教育的经历非常必要，但还是必须承认，要理解我们研究的区域，只懂得英语，只能用二手的资料进行研究还远远不够。因此，那些努力掌握两门外语的学者应该受到更多的鼓励，这样他们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学习英语和另一门外语。也就是说，除非个人期待着自己的付出能够得到回报，否则他们不会付出时间、资源和才智完成某项任务。如果目前主要依靠英语资料进行研究的趋势继续发展的话，那将会使我们的研究越来越依赖于西方的观点。

因此，笔者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应该联合启动一个项目，支持有抱负的学者在研究对象国接受必要的语言训练，获得当地的生活经历。资金是重要的，我们必须向有志于不辞辛苦学习第二外语的研究者提供更多的资金以加深其对本地区的理解。

第二，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应该联合建立一个项目鼓励和支持双方的学者研究对方国家。这种研究应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进行较长时间的研究。即使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开始直接沟通了，但如果没有这样的项目，恐怕双方只能继续依赖第三方来进行知识交流。在这方面，资金可能并不是问题，需要的是政治决心。

Zhang Yunling and Tang Shiping,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2005, pp. 48-68

到目前为止，此类研究项目只有福特基金会发起的“亚洲人研究亚洲”项目。